

# 悼念·学习·拼搏

## ——纪念刘涤源教授

黄继农

著名经济学家刘涤源先生逝世一周年了，作为受教于他较多的学生之一，又岂能无言！

1997年12月3日上午八点刚过，何炼成同志的夫人以电话转告我这一噩耗，我为之木然，继之是沉思、哽咽……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我问自己：先生的《选集》不是正在进行么？先生主编的《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不是正由他亲自审定一卷又一卷地交付出版么？还有，先生委托我增订他和张旭初、梅荣政两位同志合写的《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法研究》一书不是正在由他指导由我正在执笔么？……这个时候怎么能没有先生？！接着我从长途电话询问先生的亲属，他的二儿媳告诉我，先生于11月末患急性感冒住院，但很快就发现脸部及全身发黄、水肿，经检查确诊为急性肝坏死，终于不起。我以身体原因（心脏病，安装了心脏起搏器），老伴亦在病中，未能赴母校奔先生之丧，可我的心却飞向了先生身旁。

大约在1997年初，先生在给炼成和我的信中说：经检查，他的身体并无器质性的病症，当争取活到21世纪，像陈岱老那样。又说：他坐在电视旁看中国女排与别的队比赛，连续几小时丝毫不感困倦，先生的话并非夸张。1996年春我去拜谒他时，他头脑非常清晰，听力好，电话铃响时即敏捷地起身去拿话筒。但同时我也觉察到，先生毕竟年龄大了，由于长期伏案写作，背部明显勾偻，出门必用拐杖。近几年来虽已不写大部头的书，但在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凯恩斯经济理论评议》以后，仍要组织写作队伍（先生称之为中国研究凯恩斯主义的“马家军”）、与人通信、寄材料、筹集出版经费等等，文章还照写不误。如最近几年他写的《凯恩斯革命的内涵和真谛》、《垄断价格机理研究》的前言就是他的有份量的两篇新作，这还不算他给中青年作者的著作序言之类的东西。尤其是1995年与先生相伴40余年的夫人的不幸去世给他带来的感情上的巨大创伤，这可能是影响先生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他的夫人的死是断了他的右臂，痛哉斯言！还有，三年困难时期，先生曾染上严重肝炎，后虽度过了难关，可隐患未除呵！

先生生于1912年，活到85岁，应算长寿。他留给我们的

几百万字遗稿，是一笔宝贵财富，使我觉得他更是一名战士。他自认是一个“饱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熏陶而成长起来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只是经历了长期的学习、比较和思想搏斗，才转变为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他的目标一经确定，便矢志不移，终于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取得了独创性的成果。经济学是最接近现实的科学，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前进的速度很快，而先生又在近20年的坎坷生涯中耽误良多，但先生从不气馁，而是抓住机遇，从头开始，继续前进。他确定的基本方针是：扬长补短，缩短战线，集中精力打歼灭战，撰写3~5部颇具特色的专著。而今先生的初愿已经实现，他应无遗憾。但先生又留下了许多遗憾。例如由他和傅殷才教授共同主编的国家教委重点科研项目——《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还有七卷未经他亲自审定（他的得力助手傅殷才同志又英年早逝）完毕，已经决定由他亲自增补的《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法研究》一书中关于凯恩斯研究方法的两章还未来得及动笔……。他是货币金融专家，假如他健在，对去夏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决不会置之不理，他定会发表看法，提出对策，写成文章。他是个战士，他从未放下手中的武器（他那敏锐的头脑和战斗的笔），他终于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 \* \* \*

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在这里我只能谈两点体会：第一，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坚信不疑。如前所述，从30年代到40年代，他就熟悉西方经济学，“钻研过、信奉过、甚至传播过”那些理论，后来（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钻研《资本论》中才发现马克思所批判的正是自己曾经信奉过的东西，两相对比，发现二者是根本对立的学说，在基本原理方面是无法调和也是不可能调和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过去是、今后也仍然是检验一切经济理论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述的基本原理决没有、也不会过时。先生多次强调，这一点“必须十分明确”，“决不能有半点含糊”。但他同时指出，《资本论》出版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资本主义在发展

过程中发生了不少新事件，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亟待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去开展创造性的研究，而决不能踏在原地不动。先生不仅主张之，而且力行之。例如由他和陈恕祥、徐长生两位同志合著的《垄断价格机理研究》就是他这一指导思想的原产物。一方面他理直气壮地提出，必须把价值和价格结合起来研究才能真正把垄断价格的真相说清楚，正是垄断价格是发达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价格，非垄断价格则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价格，从这里正是探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好窗口。西方经济学家一百多年来闭口不谈价值，只谈价格，是非科学的。在这个根本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上必须对其进行驳辩，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存在缺陷，这些书在谈到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时，只是一般化地讲几条道理，干瘪得很，既不动，也无力量。长此以往，也是不行的。《垄断价格机理研究》一书对此作了可贵的探索，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一致好评。而这本书的思路是先生早在50年代就有了深切感受，并且写出了若干万字的手稿；为本新著早已奠下了基础的（当然新著往前发展了、丰富了）。按先生之意，是准备再版此书，使之更加完善的。

综观先生一生的教学活动和著述活动，我体会，都不是抽象地讲条条，而是深入到经济生活的历史实际和现实情况中去，掌握大量的事实和统计资料，然后集中起来加以纵向的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分析和综合，让事实说话，叙述时条分缕析，言之成理，言之有物。我没有研读过先生的全部文稿，但先生的主要著作，如《凯恩斯经济理论评议》和由他主持编写的《反通货膨胀论》以及《垄断价格机理研究》这几本书都贯串了上述特点。我觉得：我们大学都读《资本论》，但没有先生读得细和读得认真，理解得那么透彻。我们也写文章、写书，但没有先生展开得那样全面、细致和深刻，那么有说服力。我之所以有一种宣传先生的治学和为人的文章这么一种冲动，是因为先生的为文和为人感染和震撼了我。韩愈曾经说过：“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大概是指此吧！

第二，先生的治学方法也是很有特点的，它给人启迪，催人深思。先生把增订那本《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法研究》的任务交给我以后，我曾向他请教过许多问题，例如有一次我在信中曾向他提出可否把原书名改为：《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科学抽象法？我当时考虑，既然要读《资本论》的方法，就不能只谈科学抽象方法，还应该有其他。其次，将来书出版了，是否还要考虑一下它的市场价值，是否读者愿意买？现在人们（尤其是青年）都很务实，书又贵，从书架上看到这么一本书，可能提不起兴趣，和升学有关还是和就业有关？这和“抽象方法”又有什么关系？先生对我提出的建议开始觉得似乎有些道理，他回信说：暂不定，先考虑一下。但很快在同一封信中即对我的建议作了否定。他把理由写满了一张便笺，贴在信纸上，有的用墨水，有的则用红字。大意是：书

名仍以不改为好。如果此书全面涉及《资本论》中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以及科学抽象法，则势必精力分散，不易集中把科学抽象法写深写透，写不出特色。当然此书会要涉及“两论”，但篇幅不能过大，可集中在绪论或第一章中去写，把“两论”和科学抽象法的关系简明扼要地交待清楚。他指出，“两论”是科学抽象法的基础，而科学抽象方法则是“两论”在这一方法中的体现，这样就把全书的红线贯串起来了，这也就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啊！先生的提醒使我在迷茫中清醒起来，增强了我增订好这本书的勇气。为了鼓励我，先生一再说：“大胆去写，放手去写，我完全信赖你。”当我说将把详细提纲寄他过目时，他说：“不必再搞什么详细提纲寄来了。提纲是要的，但不必太细，它的作用无非是让执笔者心里大致有数而已，太细了反而束缚执笔者的手脚，不利于大胆发挥创造性。”先生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引导像我这样的学生和年青人的！

我和先生的最后见面是在1996年3月母校经济学院院庆期间，并有机会和他再次谈到科学抽象法的问题。他说：理解科学抽象法并不难，也并不神秘。日常生活里就有抽象，白狗、黑狗，其为狗也则一；方桌、圆桌，其为桌子也则一。给人照象，也是一种抽象，要正确的抽象，就是如何选镜头、抢镜头，也是不能拿起相机随便一按就算完事的。你应该选择一下，最能体现被摄影者的特定气质和特定状态（如凝思、眺望或专注于某事等），然后抓住时机，迅速按下快门，这样，一张照片的成功率就大。写文章、写书，如何选题，就是抽象。这就是说要抓住所论事物的本质的、主要的东西，而舍弃那些非本质的、次要的、琐屑的东西。马克思从生产商品的劳动中抽象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高得很！斯密、李嘉图也进行抽象，而且有不小的成绩，他们把经济学向前推进了。但他们的缺点是抽象不足（有时又只作一种空洞的抽象），或者抽象偏了，忽视了主要的东西或重要的环节（即所谓“中介”）。比如李嘉图分析价值，一下子把注意力都投到价值量上去了而忽视了对价值的质和对价值形式的分析，这是他区分不了价值和其发展形式——生产价格在方法论上的原因，也是他的学派后来走向解体的关键。斯密虽然大体上发现了价值，但他并不真正认识价值是什么。他们手中虽然捧着价值，就像化学史上的普利斯特列虽然析出了氧气却不知道它是何物，而真正发现氧气的人却是拉瓦锡。斯密和李嘉图谁也没有在剩余价值的纯粹形态上分析过剩余价值，而只是在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上打圈子，真理在他们面前擦肩而过（当然他们都未能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制度的成见这个大圆圈）。

先生已经长眠于珞珈山旁了！有一件事情我特别感到对不起先生：一是在他临终前我差不多有半年没有给他写信，我曾经禀告过先生，我可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给他写信，我要多用点时间啃一下黑格尔的《逻辑学》，俾便于深一层地掌握关于抽象法的问题。8月末，先生寄来一本日本学者写的《资本

论》讲座的书以及他与彭明朗同志合写的关于抽象法的文章，并在扉页上写明，书中有许多关于抽象法的例子，书看完可不必寄还给他。这是先生最后一次给我寄书并嘱咐，这似乎是某种预兆，他将无精力再去探讨这个问题，而将希望全部交付给我，似乎是在鞭策我：再大胆一些，再深入一些，坚持就会成功。谁知这是他对我的最后一言！最遗憾的是：1996年春与先生那次不寻常的会面，竟然疏忽了没与先生合影留念，而那次重返母校本来是带着照相机去的（和同班同学倒是照了几张）。因我与先生1951年秋还在湖北松滋县一起搞过土改，吃过红米饭。1996年末我写过一首“七律”敬呈先生，其中的“朔气吹衣战鄂滋”一句，即指此事。他的形象在我是忘不掉的。

\* \* \* \*

先生毕生淡泊名利，但在学术上却是雄心勃勃，不甘人后。他对于接班人和组织梯队看得很重，他注意培育经济学队伍的“马家军”（广义的），他欣赏“马家军”和中国女排的拼搏作风。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应当有许多支这样的学术队伍，它应该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是紧密联系中国经济建设和世界经济迅速变化实际的、富有创造性而又能打硬仗的队伍。1992年我在庆祝张培刚老师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的会上初次听到“珞（珈山）喻（家山）学派”的名称时，觉得这个名称很好。我现在觉得，它应当是广义的，它应当是以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涵盖武汉、两湖、豫皖等武大、华工和曾受业于这些老经济学家的更广大的经济学工作者队伍在内。张、刘、谭等老经济学家不但自己拼搏而且能组织队伍

攻关，有大将风度，这种本事也很需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学到手。

我同意这样的主张：有“家学渊源”，也应该有“校学渊源”、“系学渊源”，武大经济学是有这样的渊源的。我主张实事求是地宣传和学习对武大经济学这块阵地曾经进行过艰辛耕耘的那些学者们的事迹，如杨端六、刘秉麟、戴铭巽等先生，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这些人就曾聆听过他们的教诲。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在经济系任教的李剑农、皮宗石、任凯南等诸先生，他们或者在学术上，或者在领导系务上都曾作过重要贡献。又如新近去世的吴纪先先生和前些年去世的邓启东先生、曾启贤先生等，也是对学生影响较大的学者，都应当在适当的刊物上作些宣传介绍。1996年3月的那次院庆前的筹备工作中，我就曾打算提这个建议，把从武大经济系建系以来直至现在的一些资深学者都分别写一小传，并附以照片，陈列出来，让学生和历届校友都知道他们。我总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任何人的成就都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去要求前人。我们应该给后学者以一种历史的、学风的、人格的启迪和教育。武大的经济学院、系，华工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等，都是一代一代学者和先贤坚实努力和积累发展而成。这些话我是给执事者先生们的一点建议，未必允当，供参考吧。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69）

（责任编辑：杨宗传）

（上接第95页）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票据这一传统基础性金融工具，以其变现期限短、成本低、流动性强等特性，比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更容易操作，也就有相对宽松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借助票据金融公司的建立，不仅填补了票据市场中介机构的空白，而且借此打开了券商介入货币市场业务的缺口。使之间接参与货币市场业务，有利于扩大业务范围，优化自身业务结构，增加新的利润来源，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通过加强与票据市场各业务主体的交往，实现与商业银行之间正常的短期资金流动，打开中央银行通过票据市场实施货币政策的通道，有利于实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沟通和衔接。这意义是远非开发几个附加值高的金融衍生品种所能比拟的。

### 3. 对经济运行及金融调控的促进作用

票据金融公司能够开发出商业票据的投融资功能，改变企业对银行长短期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有利于企业按市场规则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强化债务约束，提高企业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债务清偿的效率，促进企业改变资金供应全部依赖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长期化、固定化的状况。这既是商业银行减少信用放款，提高资产质量的需要，又是将企业之间信用关

系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的需要。

票据金融公司对票据业务的全面介入，引入了合理的竞争机制，有利于调整属于银行总资产中可流通变现的票据存量的份额，以及贴现业务占整个信贷资产的相应比例，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资产结构，促进商业银行在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提高其资产的盈利性。

对中央银行开办再贴现“窗口”业务来讲，金融票据公司解决了我国票据市场缺乏中间环节与中介机构的弊端，实现了票据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流通渠道的多样化，使票据的承兑、贴现、转贴现规模和范围极大地提高。促使商业票据、银行票据真正成为—个安全性、流动性管理的有效工具。扩大了再贴现业务的广度和深度，促使各种短期信用工具依其品质、发行期限，建立以贴现率为基准的短期利率结构体系的形成，有利于再贴现率整体发挥短期基准利率的作用，使贴现率在我国成为一种重要的价格信号，对市场利率产生“宣示效应”，起到“指示灯”和调节银根松紧的杠杆作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刘传江）